



美国画报上  
的中国  
1840—1911

〔美〕张文献 编

CHINA  
VISUALIZED  
BY  
AMERICANS  
1840—1911



美国画报上  
的中国  
1840-1911

CHINA VISUALIZED  
BY AMERICANS  
1840-1911

〔美〕张文献  
编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美国画报上的中国: 1840—1911 / 张文献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301-28394-3

I. ①美…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 - 1840 - 1911 - 图集 IV. ①K252.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8567号

书 名 美国画报上的中国: 1840—1911  
MEIGUO HUABAO SHANG DE ZHONGGUO: 1840-1911  
著作责任者 (美) 张文献 编  
责任编辑 谭 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394-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mailto: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910  
印 刷 者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9印张 429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目录

序	/1
前言：美国书报里的中华文化与中国议题	/7
第一章 大清军政：19世纪中后期的天朝政治、军事与外交	/21
一、社会巨变下的中国与世界	/22
二、乱世里的风云人物	/52
三、殖民主义时代的中美关系	/66
四、硝烟战火中的内乱与外患	/86
第二章 泱泱中华：迤邐壮观的华夏帝国	/103
一、夕阳中的巍巍帝都	/104
二、秀丽多姿的南国门户	/114
三、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	/125
四、五湖四海的中华景观	/144
第三章 市井人文：晚清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	/155
一、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	/156
二、农耕传统下的经济民生	/173
三、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192
四、民间休闲与娱乐	/219
五、三教九流，芸芸众生	/232
六、难以想象的千奇百怪	/250

第四章 大洋彼岸：新大陆华人的生存与奋斗	/263
一、心驰金山，梦断花旗	/264
二、华工的汗水与血泪	/284
三、唐人街：华人在美国的家园	/305
四、早期华人移民掠影	/329
第五章 亚美利坚：美国政治中的华人问题	/353
一、华人移民与选举政治	/354
二、阿兴：来自中国的异教徒	/383
三、《排华法案》：中国人必须走！	/417
四、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437
中国近代史与中美外交大事记	/451
主要参考书目	/456



---

数月前，美国罗林斯大学奥林图书馆档案特藏部主任张文献教授跟我联系，说想约我为他即将在国内出版的新书《美国画报上的中国：1840—1911》写一篇序言。我本与张教授素不相识，但在看了他书稿之后，颇为其内容所吸引，故欣然命笔。

## 序

沈弘

这本书稿中收录了辛亥革命之前美国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出版物中近千幅跟中国相关的版画插图和封面。这在国内同类出版物中可能要算是收录得最全的，这一点也是该书稿最令我感到称奇的地方。我本人因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在过去15年中一直在欧美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收集和研究西方出版物中反映中国的图像资料，所以深知要收集这么多的版画插图和封面实属不易。上述版画的来源，如《格立森画报》(*Gleason's Pictorial Drawing-Room Companion*)、《宝楼氏画报》(*Ballou's Pictorial*)、《弗兰克·莱斯利新闻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哈泼斯月报》(*Harper's Monthly Magazine*)、《哈泼斯周报》(*Harper's Weekly: A Journal of Civilization*)、《顽童杂志》(*Puck Magazine*)和《马蜂杂志》(*WASP Magazine*)等报纸杂志因其年代久远和罕见珍贵程度，一般都收藏在图书馆的善本特藏部或档案特藏部，普通读者很少能够见到真本，如想借阅，图书馆员们往往会建议你去看缩微胶卷。即便是学者想要调阅真本，那也得提前预约，而且每次调阅的画报数量会极其有限。以周报为例，假如它从1850年一直办到1910年的话，那理论上全套总数就会有近3300期。倘若图书馆只允许你每次调阅5期的话，那你就得预约和跑图书馆至少660次以上，才能将它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假如是在国内，很多图书馆可能还有价格不菲的收费，这样的话，不仅时间耽搁不起，就连所需花费的钱也会难以计数。

上述推测仅仅是建立在图书馆收藏资料齐全的基础之上。但

---



美国画报上的中国 1840—1911

实际情况是，即便是像哈佛大学图书馆这样的国际顶级研究图书馆，上述报纸杂志的收藏也是不全的。且不说像《格立森画报》和《宝楼氏画报》这样相对比较罕见的报刊，就连像《弗兰克·莱斯利新闻画报》《哈泼斯月报》《哈泼斯周报》《顽童杂志》和《马蜂杂志》一类相对较为常见的报刊，因长期使用所带来的损耗和失窃等原因，一般来说也不会齐全。我本人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做过几年的研究，也访问过不少欧洲大学的图书馆和几乎所有的美国常青藤大学图书馆，对于这一点深有体会。

即便是学者调阅了真本，也不一定就能够复制作为杂志封面和插图的版画。每个图书馆都会有自己特殊的规定，对于善本特藏的使用有各种限制。一般来说，会要求调阅报刊的研究者与图书馆签订一份协议，保证遵守图书馆的相关规定和限制。由于一百多年以前的报刊纸张发脆，容易损坏，为了防止报刊的损耗或损毁，一般不允许拿去复印，只允许在不使用闪光灯的情况下，用数码相机进行拍照；或在个别情况下，允许用扫描仪进行扫描。而且，按照上述协议的规定，研究者复制的图像一般只能用于个人的学术研究，不能任意扩散，也不能随便用于商业目的。

撇开上述所有的限制和协议不论，用拍照或扫描获得的图像资料，还得逐一用计算机的图像软件进行特殊处理（如去网格、锐化对比度和修补残缺等）之后，才能够符合印刷出版的要求。图像处理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活，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对一张图像的处理往往需要花很长时间修缮和修复，才能够达到差强人意的出版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要收集和获取近千幅版画的图像，并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和图像处理，那该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说上面这番话，是为了强调本书所收录的那些版画图像确实来之不易。虽然国内也有同类的书籍，但是在所收集资料的齐备性和丰富性上，均难以与本书相比。以其美国大学终身教授和美国档案学会会员的身份，以及奥林图书馆档案特藏部主任的职位，张文献教授“近水楼台先得月”，也许是收集上述珍贵版画图像资料和编纂这样一本图文书的最理想人选。

除了在美国早期报纸杂志中收集跟中国相关的版画素材实属不易之外，本书所收录的那些版画的内容也十分丰富，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张教授将全书分为“大清军政”“泱泱中华”“市井人文”“大洋彼岸”和“亚美利坚”这五章，除了其中第三章有六小节之外，其余各章下面均有四小节。换言之，作者在对所有这些版画进行整理之后，将它们分门别类，归在了“中国与世



界”“风云人物”等22个不同的小标题之下。浏览全书之后，我对以下这几个部分内容的印象比较深刻，愿意在此提出来，与大家共享。

美国早期报纸杂志中有关中国的图像，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漫画的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美国人心目中主要的中国人形象是凭借妖魔化想象而塑造出来的所谓“满大人”，即一个丑陋、猥琐、保守和愚钝的漫画式东方人形象。几乎所有上述美国报纸杂志都不能例外。但在所有这些漫画作品中，艺术性最高、原创性最强的，因而也最吸引读者眼球的要数《顽童杂志》的彩色漫画。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介绍的那样，《顽童杂志》创刊于1871年，是美国最早成功采用彩色石印版画的一个周刊。直至1918年停刊为止，它所坚持下来的一个传统就是重视彩色的漫画，每一期的封面（有时还包括封底）以及中间的一个双页，都会刊登彩色的政治漫画。它也是在美国报刊中最早采用彩色广告的。由于该杂志雇用了伯纳德·吉勒姆（Bernhard Gillam, 1856—1896）、利文斯通·霍普金斯（Livingstone Hopkins, 1846—1927）等当时美国一流的漫画家，所以该杂志的彩色漫画作品相对来说构思比较巧妙，色彩鲜明，线条简练，人物形象较为饱满，但最重要的是数量庞大。它与大洋彼岸英国著名的漫画杂志《笨拙》（*Punch*）遥相呼应，几乎可以相提并论。

与上述漫画传统相对应的是一种主要依靠到现场进行写生和素描的写实传统。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要数《哈泼斯月报》所派遣的画家在京杭大运河苏州至杭州段进行的为期一年的采风过程中所画的风景速写和人物素描。1894年，美国作家朱利安·拉尔夫（Julian Ralph, 1853—1903）受《哈泼斯月报》编辑部的派遣，到中国南方江苏和浙江的大运河沿岸来体验生活，采访调查和进行文学创作。同行的还有一位叫韦尔登（C. D. Weldon）的画家，奉命为前者在中国京杭大运河沿岸创作的一系列短篇故事画插图，他以简练的笔触和透明的色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杭州作为江南水乡的鲜明特征。由于创作灵感来自真实的生活，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和景观无不显得栩栩如生。

韦尔登是当时美国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眼光和对色彩的感受力都极为敏锐，跟作家拉尔夫一起在杭嘉湖平原的农村进行考察时，那儿浓郁的乡土民俗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根据拉尔夫在其后来将这些故事结集出版的《独自闯荡中国》（纽约，1897）一书前言中的介绍，画家韦尔登对于当地老百姓的服饰式样和色彩十分痴迷。尤其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运河边一家磨坊老板的14岁女儿，不仅模样俊俏，而且服装也十分独特，上身穿的是一件黑色小褂，下面则是一条浅蓝色的裤子。画家感叹自己的颜料无法表现出那种独一无二的靛蓝色。令韦尔登印象深刻的并不仅限于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服饰，他的画笔还记录了有着明显的江南风



美国画报上的中国，1840—1911

格的苏州和杭州老房子的窗、门、屋檐和墙等各种细节，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画家笔下其他具有鲜明杭州地方特色的景观还包括大运河上式样古朴而又装饰精美的客船。大运河上过去还有一种独特的捕鱼方式，那就是渔民驾船带着鱼鹰去抓鱼，时过境迁，人们现在很难再看见这种独特的捕鱼方式，如想忆旧，就只能从韦尔登的画中去领略一番了。杭州现在虽然还有少数老房子保留了下来，但是更多的古建筑结构和装饰细节却都已经失传。幸运的是，从韦尔登的另一张名为“清朝官邸”的插图中，我们还可以见识到一些有关中式门窗上的装饰图案、方形灯罩，以及藤编凳子等珍贵古建筑和室内装饰的细节。清末的杭州城内外水道纵横，运河交错，运河上的住家船和运河边的建筑等构成了杭州作为江南水乡的基本要素。从韦尔登题为《河畔茶坊》的插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住家船的样式，以及运河边上低矮简陋但仍不失优雅的民居建筑。而在一张题为《河畔憩息》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杭州凉亭和小桥的模样。其中那座具有众多台阶的青石板石桥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假如我们把这张画跟曾任之江大学校长的费佩德于民国初年在杭州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的石桥做一下比较，就不难发现韦尔登的画作相当真实和准确地再现了当时江南随处可见的青石板桥式样。

虽然在《格立森画报》和它的后继者《宝楼氏画报》，以及《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报刊中也能看到属于这种写实传统的现场速写，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三个报刊1850—1890年间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跟风、模仿和抄袭的作品。在1891年美国正式颁布《国际版权法案》，并开始对主要来自英国的外国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之前，美国曾一度是盗版者的天堂。所谓跟风和模仿，就是把别人作品的构思或构图拿过来，改头换面地画一下，或者干脆在别人的现成作品上再添加几个人物。所谓抄袭，就是把别人刚发表的作品直接拿过来，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假如我们把《伦敦新闻画报》与上述这三个美国报刊仔细地加以对比，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本书中第一章的《英国兵船》《清军击鼓手》《抢救伤员》《准备冲锋》《战前祈祷》《准备行动》和《阅读英军安民告示》，第二章的《弧形大街》和《广州老城》，第三章的《工作便餐》《香港茶会》《旧式客厅》《游途小憩》《涉水过河》《抽茧缫丝》《拜天地》《丧葬》《工余自乐》《香港赛马》《抽大烟》《广州烟馆》《饮酒划拳》《中医大夫》《母女梳头》《舢板姑娘》《江湖相士》《水上勇士》和《中国巨人》，等等，都是直接从《伦敦新闻画报》窃取来的。这些版画作品通常是刚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一个月左右，便被照搬到了上述这三个美国报纸杂志之中，其中时间最短的是仅在两周之后。这种顺手牵羊拿来的作品毫无原创性，因而也毫无思想性、艺术性可言。复制品一般在质量上总是低劣于原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以讹传讹。以第168页的《涉水过河》为例，原作的文字说



明是中国台湾岛上的土著背着英国画家过河，而在《宝楼氏画报》中则变成中国内地的向导背西人过河。

事实上，本书中原创性最强、史料价值也最高的应该是最后两章的内容，即反映华人移民美国之后的遭遇和在美国生活的情况的作品。这方面的历史背景和华人在美国的情况，编者在前言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我就不再赘言了。

### 三

由于本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百年前中国社会生活和中美跨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所以编辑此书具有很大的难度，要求编者具备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结构。

这近千幅画作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大。若要为每一幅画作内容写作背景的介绍，需要阅读海量的相关文献，并且会涉及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背景。编者百密一疏，在解说这些版画作品所包含的潜在信息时，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或者在措辞上会有不太到位的地方。然而瑕不掩瑜，我认为本书将会是一本具有很高史料和艺术价值的好书。它通过展示 1840—1911 年这 71 年间的近千幅版画，直观而生动地向读者介绍了这一时期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清末华夏大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早期赴美华侨们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逐步融入美国社会的。它不仅可能成为受普通读者欢迎的畅销作品，而且还将为研究中美历史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提供有用而珍贵的研究素材。

是为序。







中西方文化之间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无知无视、好奇接触、鄙视抨击，到深入了解与接受认可的曲折过程。中美两国之间的全方位了解和认识，同样漫长与复杂。虽然 1784 年的“中国皇后号”之旅开创了中美经贸与外交的历史纪元，然而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和美国西部发现金矿以后，中美两国之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接触。交流总是双向的，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美关系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清朝道光年间的禁烟领袖林则徐曾经向当时的知识阶层介绍美国，大清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徐继畲在其所著的《瀛寰志略》中更是盛赞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其文字至今仍保存于华盛顿纪念碑内。而自容闳负笈耶鲁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第一批学童官派留洋，美国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以及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被陆续引入中国，对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过去的两百年间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一些新闻媒体已将中美关系称为 21 世纪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2015 年秋中国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中美双方重新确认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历史是一面镜子，有鉴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基石，重温美国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过程具有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西方人眼里的近代中国

作为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中华文明一直是颇具包容性的。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就开始与当时的西方进行接触，丝绸之路便是古代中国与世界积极交往的最好证明。即使是几次中原政权被北方游牧势力武力征服，异族文化也很快被吸收同化，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唐盛世留给后人的记忆是中华文明的



开放与自信，而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更是激起了西方民众对东方这个强大帝国的无穷想象。曾几何时，自视位于天下中心的中国统治者开始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沾沾自喜于万国来朝的虚荣。郑和下西洋船队之壮观，也只是为了宣扬皇威浩荡，与数十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的开创性历史之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哥伦布偶然发现新大陆只是为了探索开辟到达东方的新航道。更为严重的是，明清两朝为了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长期施行“尺板不得出海”的海禁政策。其本意是保障社会稳定，然而真正受到打击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及沿海渔业，海盗和走私活动反而因为海禁而变得更加猖獗。这项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消极影响。

虽然明清之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但遥远的欧洲已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启蒙运动，看到了工业革命的曙光。此时的中国在西方人士心目中依然是理想的天国，有着完善的科举与任人唯贤的文官制度。于商人而言，东方意味着财富，而基督教士更是认为到中国传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责任。于是自16世纪末利玛窦开始，天主教耶稣会士不远万里纷纷来华传教，同时虚心学习中华文化；随后欧洲商人和以通商为目的的各国使节也来到中国，初期集居于澳门、广州一带，然后由广州沿北江、赣江、长江、大运河一路北上抵达帝京。至19世纪，西方列强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主义扩张与掠夺。鸦片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中国的海防门户，重创了清朝统治阶层的傲慢自大心理，同时也使得西方人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

中西方文化自19世纪开始有了全方位的深度交往。中国门户大开，各种心态各异、身份不同的西方人更是蜂拥而入，其中不少来自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例如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1832年在广州出版的《中国丛报》，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英文期刊，裨治文也用中文编写了《美国志略》，以娴熟的中英文向中西方介绍彼此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成为了中西文化的桥梁。早期美国来华传教的还有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其《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是标志着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之作。另一位美国汉学家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在1849年神学院毕业后立即接受派遣，在福州传教二十余年，其代表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ns,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从政治、经济、民间信仰、习俗、宗教、教育等多个视角,极为翔实地对清朝社会进行观察与描述。其他有名的美国在华传教人士还包括隶属于美国南长老会的司徒雷登的父亲、于 1868 年来华并在杭州传教 45 年、为中国教育培养了两位大学校长的司徒尔 (John Linton Stuart, 1840—1913), 以及曾任汇文书院院长、翻译介绍《本草纲目》的师图尔 (George A. Stuart, 1859—1911) 等人。这些美国人在传教之余,认真学习汉语与方言,努力了解当地社会,积极探讨研究中国文化。

除了传教士外,19 世纪以来美国在华人士中还有不少商人与政客,以及诸如命丧征伐太平天国战场的华尔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 与白齐文 (Henry Andres Burgevine, 1836—1865) 等江湖浪人,另外就是一些曾经走访中国的美国作家、记者与画家。他们的初衷是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从其发表的文字与图画记录可以看出,他们的足迹曾经遍及大江南北。这些人津津乐道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不仅详细介绍与报道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社会、民俗、文化以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尽管这些人的记载多为走马观花式的泛泛之作,却涉及了清朝社会从衣食住行到经济民生的方方面面;虽然这些文字与图画只是零星地散落在各种美国报纸杂志中,不少却是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观察资料。这些报道不仅展现了从岭南到北京各地山川河流等的自然风貌,以及园林建筑与名胜古迹,而且也反映出晚清农林牧渔、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情况,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他们的笔下不仅有与清朝官员的交往,对太平天国的评论,也有舟车旅行的记录和对社会底层生活的观察,等等。通过这些记述,读者不仅可以了解 19 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生产运输方式与各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在今天依然可以体会到当时社会存在的鲜明的等级与贫富差别。与其他早期到访和旅居的西方人一样,美国人观察中国社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由于他们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观察中国,因而能够注意到不少中国人习以为常或者不屑一顾的现象,发掘出中国人自己未曾发现的事物内涵与侧面,提出不同而又十分重要的观点,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也能让我们了解美国人对华夏文化的认知过程。

以 19 世纪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必然有其历史局限,这些美国人所记录的中国人物形象往往带有西方人的特点,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妥的甚至是错误的记载与见解。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了解,张冠李戴的事情时有发生。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本书收录的一些美国人有关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与人物的报道与图片，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占据主流的西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而有些描绘与评论更是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恶意攻击和诋毁。这些资料能够在号称新闻自由的美国出版刊行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上的原因；收录在此的目的自然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相信今天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时自会鉴别判断。

## 中美近代外交关系

中美两国文化开始交流的时期，正是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时代，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与中国的闭关自守和对世界的孤陋寡闻形成鲜明对比，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已经开始接触儒家学说，他们对于孔子的伦理道德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仁君统治的政治理念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受之影响，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曾把源自孔子道德哲学的价值观付诸 18 世纪下半叶的建国实践中。美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认为儒家哲学于全人类都是颇有价值的道德理念；而美国早期哲学家与政治活动家、《常识》（*Common Sense*）的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则认为孔子与耶稣和希腊先哲一样，都是人类道德文明的导师。据华裔学者王小良考证，《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在其个人图书馆中收藏了有关孔子推崇圣王周公的诗篇；《美国宪法》之父、《人权法案》主要作者、第四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也曾在其弗吉尼亚的住所中悬挂过孔子画像。与同时期乾隆皇帝（1711—1799）的踌躇满志和故步自封相对照，这些美国先贤不仅积极了解东西方文化，而且敦促公民们躬行儒家哲学中的积极成分，按照圣哲的示范提升道德品行。

中美两国的第一次接触始于 18 世纪末的“中国皇后号”之旅。其时新近独立、国库空虚的美国为开拓被英国所封锁的海外贸易路线，派遣由战舰改装的武装商船满载着以人参、皮毛为主的货物，前往澳门与清廷进行贸易。1784 年 8 月 28 日，“中国皇后号”进入广州港后鸣炮十三响作纪念，并挂起十三星的美国国旗，是为美国国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境内，开创了中美经贸与外交的历史纪元。“中国皇后号”



于次年返抵纽约，立即轰动全美商界，掀起一股中国热。纽约街头上开始出现推销茶叶、瓷器和丝绸制品的广告。这些来自东方文明大国的货物，受到美国人民的喜爱，据传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也曾收藏了一只来自“中国皇后号”的茶壶。中美航线被打通后，“中国皇后号”上的押运商塞缪尔·肖（Samuel Shaw, 1754—1794）随即被任命为首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在优厚利润的吸引下，美国商人纷纷举帆远航。美国对华贸易迅速赶上荷兰、丹麦、法国等国而跃居第二，仅次于老牌海洋霸主英国。

1843年，美国政治家与外交家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专员，驻扎在澳门，并于1844年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1787—1858）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了美国与中国的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这个比照《南京条约》的《中美五口通商章程》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开放口岸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而且美国人不受中国司法管辖，亦即享有治外法权。1858年，在清政府与英法联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Reed, 1806—1876）即与大学士桂良（1785—1862）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使美国获得了与其他列强同样的利益。1862年，美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建立驻华公使馆，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成为首位常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而清朝则一直延迟到1878年，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设立永久性驻美公使馆，首任公使为宗人府丞陈兰彬（1816—1895）。

蒲安臣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过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在其任内促成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是晚清时期中国的第一个相对平等的对外条约。1868年7月28日，清朝委任当时已离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于华盛顿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以西方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两国的对等地位，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条约规定中美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中国皇帝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其领事特权与豁免权和英俄驻美领事相同；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公立学校求学或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等等。《蒲安臣条约》为中国劳工移民美国敞开了大门，而早期的华人移民则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与西部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由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对华工的激烈排斥，华人成了美国内战之后经济衰退引起的各种社会冲突的替罪羔羊。以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 1831—1886）为代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华工不仅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且华人移民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在风起云涌的反华声浪中，美国于1880年修改了《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允许美国暂停华人移民；又在1882年5月6日由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 1829—1886）签署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它是在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移民的法案，也是美国历史上对外国移民最为严厉的限制之一。《排华法案》在十年内禁止雇佣华人劳工进入美国，否则将遭到监禁或者驱逐，许多华人仅仅因为他们的种族而遭到残酷殴打迫害；而且法案剥夺了华人移民的美国公民权，从而使华人永久孤立，任何华人离开后想要再次进入美国必须要获得许可。1892年该法案将《基瑞法案》（*Geary Act*）延长十年，至1902年更成了永久性法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成为反法西斯盟友，经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国会才于1943年12月17日表决废除了所有的排华法案。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由美国推出的一种外交理念，其基本原则为所有的国家在中国均享有平等的商业和工业贸易权。最初由著名汉学家、后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 1854—1914）构思的门户开放政策，经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 1838—1905）于1899年提出，不仅成为当时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石，而且也是美国在外交上不再追随英国的重要标志。美国在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正式吞并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在远东的势力大为增强。然而同时，欧洲列强包括英、法、德、俄四国与日本已经准备瓜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美国感到其在华商业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适时提出了这项平等划分在华利益的政策。庚子之变后，美国和诸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1902年，美国政府抗议俄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拒不撤兵满洲违反了门户开放政策；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取代俄国取得满洲南部，美国和日本共同承诺要维持在满洲的平等。但是通过《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所谓的特殊利益，导致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约束力下降。虽然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九国公约》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但是随着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侵略中国东北并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美国的这项对华政策至此彻底破产。